

思想市场

——分析经济学说演化的一个模式

张旭昆 著

● 浙江人民出版社

思想市场

SIXIANGSHICHANG

SIXIANGSHICHANG

SIXIANGSHICHANG

的，还从规范角度分析了应当以什么样的政策来促成经济学说更好地发展演化。书中多处指出思想市场的独家垄断对经济学说发展演化的不利影响，肯定了思想自由发展的政策是最有利于经济学说发展演化的政策。回顾比较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学的发展情况，对于这一点大家都有深刻感受。张旭昆这本书的意义在于通过供求分析，划分思想市场的两种基本类型，论证了大家深有感触的事情。

经济学一向是研究物质产品（包括劳务）的生产活动的。现在张旭昆的这本书把经济学的方法用来研究一部分精神产品的生产活动，也许这是精神产品经济学（与物质产品经济学相对应）的一个开端。我们不仅要研究物质产品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研究人自身的生产（通过人口学），还要研究精神产品的生产（通过有待建立的新学科），这也许是张旭昆的这本书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

宋承先

1992年4月于上海

前 言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管是
对的还是错的，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
预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
而已。

J·M·凯恩斯在其名著《通论》结尾处所写的这几句话，固然不无夸张之处，却强有力地表明了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在人类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作用。因此，完全有必要像自然科学家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科学家研究社会现象那样来研究这些学说本身。囿于笔者的知识结构，本书只能局限于对经济学说的研究，但自信本书的研究结果在相当大的范围里和程度上也适用于政治学说。

（经济学说是一种人文现象。对人文现象的研究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1）探讨某一人文现象的意义（包括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即意义研究。这种研究要对该人文现象的内容作出说明和解释。对于经济学说来讲，意义研究就是要说明各种经济学说的内容，进而评价其内容的真伪和功用（它是对还是错，是否符合现实，对我们是否有用，是否能给我们以启示）。（2）探讨某种人文现象的产生与发展，即生成研究。这种研究要说明某种人文现象是如何产生、如何演化的，演化的动力何在，演化的特征是什么。对于经济学说来说，生成研究就是要说明经济学说是如何发展演化的（从重商主义到亚当·斯

密、到李嘉图、到边际革命、到凯恩斯，经济学说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其动因何在，其特征是什么）。

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关于经济学说的论著，往往侧重于前面所说的意义研究，其内容大多是按照人物或流派，或按照特定的专题，由远及近地介绍历史上出现的各种经济学说，同时对其进行真伪（对错）评价和功用评价。

本书主要是对经济学说进行生成研究，把经济学说的产生和发展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研究它是如何演化的。因此本书进行的分析，不再是真伪评价和功用评价意义上的分析，而是演化分析。这种分析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对生物界所进行的研究，进化论并不对进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物种进行功用评价，只是研究物种产生和消亡的一般模式。

在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对于经济科学演化的原因和机制，长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经济学说的产生与演化是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变化的结果。按照这种看法，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工业革命前夕英国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的产物，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工业革命的产物，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是英国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的产物，凯恩斯革命是大萧条的产物。这种观点可以简单（但不一定精确）地称作外因论。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可以看作是这种外因论的典型之一，它强调社会经济政治状况造成的阶级结构对经济学说演化的决定性作用。而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有类似的看法。如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米契尔“就十分强调经济史事件产生的问题对经济理论建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①。另一种看法可以简单（但不一定精确）地称

^① 参阅〔意〕卡洛·M·奇波拉主编：《欧洲经济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404—405页。

作内因论，它强调经济学说的产生和演化是经济学说自身内在逻辑的结果。如当代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就认为对经济学说的发展“起决定性影响的是内在价值和本学科的压力。……暂时的经济环境在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只起很小甚至偶然的作用”^①。

本书认为，外因论与内因论之争，类似于马歇尔之前关于价值决定的生产费用论与边际效用论之争。其实，对于经济学说的产生与演化来说，内因与外因是交互作用的，就像商品价值由供求的相互作用来决定一样。承认内因与外因的交互作用，也许并无新意，本书的新意在于指出，只要把经济学说产生和演化的过程看作是一系列思想产品的生产过程，那么便可看到，外因主要作用于对思想产品的需求，内因主要作用于思想产品的供给。内因和外因的交互作用便可以借用经济学中的供求模型对经济学说的产生和演化加以说明。

经济学说的发展，是存在某种特定的次序的。任何一种新的思想产品的产生，必须依赖某些早先已经存在的思想产品，以后者为先决条件。设思想产品A为思想产品B的先决条件之一，若A尚未生产出来，则无论社会对B的需求有多么强烈，它仍然是无法生产出来的。马歇尔的供求均衡价格论必须以关于价值决定的生产费用论和边际效用论为先决条件。凯恩斯经济学必须以马歇尔的均衡分析、北欧学派的投资—储蓄分析为先决条件。对经济萧条的解释，社会早有需求，凯恩斯所考虑的问题，西尔蒙第和马尔萨斯都曾经考虑过，但由于必需的先决条件不具备，尤其是投资—储蓄分析在那时尚未出现，所以他们都只把消费作为有效需求的全部，忽视投资也是有效需求

^① 转引自〔英〕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的革命与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75、378页。

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决定有效需求的规模时具有巨大作用。因此，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都只能以消费不足来解释萧条，不可能提出凯恩斯后来所提出的理论。可见，经济学说的发展不能单纯从社会需求等思想史外部的因素去加以说明。

同时，经济学说的发展也并不带有宿命论的性质。设思想产品A是B的先决条件，并非A一旦生产出来之后B就一定跟着出现。B不是A的必然结果，A只是B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正如R·K·默顿所提出的：“在某种程度上说，科学发现的出现一定存在一种固定的顺序，每个发现必须等待某些先决条件的发展（这种说法的逆命题并不像有些文化社会学家想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必然成立的——一个发现并不一定随着其‘组成要素’的存在而必然产生，这已被科学史所证明）”^①。思想产品A生产出来之后B是否被生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思想史外部的因素。若无30年代大萧条的刺激，即便掌握了马歇尔的均衡分析和北欧学派的储蓄—投资分析，凯恩斯也只能生产《货币论》而非《通论》，凯恩斯革命将不会出现。虽然当时生产像《通论》这样的思想产品所必需的理论上的先决条件大多已经具备。因此可以说，经济学说的发展同样不能单纯从思想史内部的因素去加以说明，就像它不能单纯从思想史外部的因素去加以说明一样。它只能从思想史内外部因素所决定的供求双方的交互作用来说明。

要运用供求模型来说明经济学说的演化，就离不开对于供给者（经济学家）和需求者（公众、政府及经济学家团体）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的分析。而这种分析正是科学哲学所忽视了的。波普、拉卡托斯、库恩等人分析了科学发展的特征，但

^① [美] R·K·默顿：《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106页。

没有分析科学家为何要去证伪，为何要坚持或放弃一个科学纲领，为何要进行革命。而这一切都可以从广义的经济人假设中得到说明。经济学家并非喜爱挑剔、并非固执、并非喜新厌旧。他们既非脾气怪僻也非超凡脱俗。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自身利益出发去从事经济学思想产品的生产。区别在于，经济学家追求的利益，在性质上与各经济主体有所不同，具有更高雅的光环。他们更多地追求声誉最大化，当然也回避金钱。他们谋取自身利益的主要投入是通过学习积累起来的知识。他们就像投资者选择最佳投资机会那样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知识的特点进行“投资”活动——选择能获取最大预期声誉报酬的研究课题。在这种活动中他们受到信息和制度等因素的约束，也像投资者一样面临风险和不确定性。

广义经济人假设也适用于思想产品的需求者，他们在消费思想产品时追求效用最大化。面临可供选择的各种思想产品时，他们总是根据它们各自的采纳收益和采纳成本作出抉择。

为了对经济学说进行演化分析，本书大量采用类比方法，大量地借用经济学中的概念，如“市场”、“均衡”、“供求”、“最终产品”、“中间产品”等。这种做法是基于下述假定，即思想产品的生产和物质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相似之处^①。因此可以借用经济学中分析物质产品生产的方法来分析思想产品的生产。同时，经济学也是在研究人文现象的各类学科中，相对来讲比较成熟的一门科学，因此借用经济学的概念，采用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经济学自身的演化，可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当然类比和借用并不意味着把经济学中

^① 参阅〔英〕约翰·齐曼：《元科学导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的概念生搬硬套地用于说明经济学说的演化过程。

在采用类比方法、借用经济学概念的同时，本书还力求采用数理方法来研究经济学说史。数理方法对于许多学科的进步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一部近现代科学史，从某种意义上讲便是数理方法进入一个又一个学科的历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必须引进数理方法。当然，这是一桩非常艰巨的任务。主要的困难在于经济学说史中的概念按传统观念来看，是非量化的概念，如“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这一概念，它所表示的对象没有多少的区分和变化，只有存在和不存在、有和无之分。当李嘉图未提出它时，它不存在，当李嘉图提出它之后，它存在。经济学说史中的许多其他概念，也具有类似特征。因此，可以用数学中的某一支——布尔代数——来为经济学说史的演化建立模型。在布尔代数中，任一变量 x 都只能取两个值：0 和 1，表示该变量所表示的对象的无和有。布尔代数中的运算主要有两种：加（+）、乘（ $\times$ ），满足规则： $1+1+1+0=1$ ， $1\times 1\times 1=1$ ， $1\times 1\times 0=0$ 。按照这些规则，便可以为经济学说的演化建立相应的数理模型。例如，令 x_1 代表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令 x_n 代表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令 x_n 代表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论，则可建立下述函数关系： $x_n=x_1\times x_n$ 。它表明，只有当 x_1 和 x_n 都等于 1 时， x_n 才等于 1。即只有当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和庞巴维克的资本利息理论都出现之后，才可能出现威克塞尔的累积过程理论。只要 x_1 和 x_n 中间有一个为零， x_n 便等于零。这样一个简单的例子表明，认为像经济学说史这样的学科完全不可能采用数理方法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关键在于采用什么样的数理方法。当然，引进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说史的演化并非易事。但也正因为此，它才更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智力挑战。

对于像经济学说这样一类人文现象的研究，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方法，多年来一直是有争议的。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引进自然科学的方法，使人文科学逐渐转变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实证科学。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人文现象不同于自然现象，自然科学的方法不运用于人文科学。第一种意见可能适用于对人文现象的生成研究，但肯定不适用于对人文现象的意义研究。第二种意见适用于意义研究但不适用于生成研究。可见两种意见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是要分清对人文现象的两种研究，即意义研究和生成研究。

通过引进供求模型和数理方法，对经济学说的生成研究将不再仅仅是回顾性的，还将是前瞻性的。它将根据对需求面的分析指出经济学说未来所需要的发展方向，根据对供给面的分析指出经济学说未来可能有的发展方向。两个方向的交集便是新学说具有很高生成概率的地方。

若视野更开阔一点，我们就可以发现（当然还有待证实），供求模型不仅可用于分析物质产品的生产，经济学说的演化，也许还可用于分析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本书或许能为人工界及其他领域的演化研究提供一点借鉴。若今后能证明（或不被证伪），供求模型为人工界各领域的演化分析提供了统一的方法，那笔者将为本书感到欣慰。

和物质产品一样，思想产品也可分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经济学思想产品的最终产品是广义的政策主张，即关于政府、厂商、消费者和要素所有者在各种场合应如何行为的主张，或者说是关于一切经济决策主体的行动指南。其中间产品则是广义的政策主张据以推出的经济理论。

从经济理论形成经济政策，类似于用资本品生产消费品，是一种迂回的生产方法，但也是效率较高的生产方法。从历史

上看，在经济理论产生之前，就已经有政策主张。重商主义便主要是一种政策主张。从重农主义开始，出现了经济理论以及由此推出的相应政策。著名的经济表便是推出重农主义政策的理论依据。

区分经济学思想产品为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是为了便于分析。实际上它们既可能由不同的经济学家在不同的时间分头生产，也可能由同一位经济学家在同一件思想产品中生产出来。一般说来，学术论文大多是中间产品，研究报告大多是最终产品，学术专著可能是纯粹的中间产品，也可能是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结合。

经济学说是人类所生产的众多思想产品中的一个大类。对于物质产品，人们不遗余力地研究如何使它们生产得更多更好。对于思想产品也应当具有同样的兴趣，也应当研究如何使思想产品生产得更多更好。这就需要研究以往的思想产品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是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什么样的环境更有利于思想产品的生产。

人类的思想产品种类繁多，个人是难以对所有各类思想产品的生产机制作出分析的，只能对某一类思想产品的生产机制进行分析。但只要各学科学说史的研究者把研究重点从描述介绍转变为演化分析，就可能对所有各类思想产品的生产机制取得越来越详明的了解，从而提高思想产品的生产效率。

96
F091
4
✓

目 录



序	宋承先 (1)
前 言	(3)
第一章 思想产品与思想市场——概念及分类	(1)
第一节 思想产品：概念及特征	(1)
第二节 思想市场：概念、特征及分类	(7)
第二章 思想产品的需求	(16)
第一节 思想产品的需求者	(16)
第二节 需求指向及需求落点和它们各自的决定 因素	(18)
第三节 约束条件下的需求者择优机制	(37)
第三章 思想产品的供给(I)	(48)
第一节 经济学思想产品的生产要素：经济学家和 知识资本	(49)
第二节 思想产品的生产可能性集合与生产可行性 集合	(60)
第三节 经济学家的选题行为	(67)
第四章 思想产品的供给(II)	(80)
第一节 知识资本的结构特征	(80)
第二节 经济学家生产新思想产品的诸方法	(91)
第三节 经济学家的相互影响与思想产品的供给	(106)
第五章 思想市场的均衡与思想产品的演化	(116)
思想市场一般均衡的定义	(116)

· 1 ·



C

174385

第二节	思想市场一般均衡的实现机制	(121)
第三节	均衡与演化	(124)
第六章	经济学说演化概览	(140)
第一节	富国裕民：16世纪至19世纪初经济学的 主题	(141)
第二节	解释和消除收入分配不均：19世纪至20世 纪初经济学的主题	(150)
第三节	解释和消除失业：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 经济学的主题	(166)
附录一	运用点线图和关系矩阵计算命题的基础度 ...	(168)
附录二	命题函数	(171)
附录三	经济学说史大事年表(1382—1937)	(175)
主要参考书目		(195)

第一章 思想产品与思想市场—— 概念及分类

第一节 思想产品：概念及特征

一、什么叫思想产品

人们通过思维过程所产生的，并且以可记载、可传播的形式存在的所有学术观点或知识体系就是思想产品。思想产品常以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及研究报告的形式生产出来，故它的基本单位是一篇论文、一部专著或一份报告。经济学思想产品是思想产品的一个大类。

二、思想产品的特征

与物质产品相比较，思想产品具有五个特征，即公共性、单件性或斥重复性、意义的模糊性、效用的不确定性及外部性。

公共性是指思想产品在消费中不具有排他性，不像苹果，一旦被张三吃掉就不能再给李四去吃。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主张被英国经济学家接受之后并不意味着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便无法再接受它。在这一点上，思想产品与灯塔等物质产品中的公共产品相类似。

思想产品的公共性导致它的另一个特征：单件性或斥重复性。公共性意味着它可以同时被许多人使用，因此它不需要批量生产。相同的面包可批量重复生产，但完全相同的思想产品只要一件便能满足需求，不需要第二件。可以说思想产品是从第二件开始其边际效用便等于零的产品。当然，必须区分思想产品和思想产品的物质载体（如书刊）。物质载体具有可重复生产的性质。斯密的《国富论》作为一种思想产品，全世界只需要一件，但作为一本书，可重版数次、印刷成千上万册。

思想产品的单件性并不排除同一种思想的两种表达形式：专业性很强的论著与通俗化的论著。它们是用于满足不同的需求者的。例如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是供专业学者所用的，具有强烈的专业色彩；而他的《经济学》教科书，则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以通俗化的形式重述上一部书的思想，是供广大公众看的。

思想产品的单件性、斥重复性，使得运用数理方法描述思想的演化颇为困难。迄今为止，凡是成功地运用数理方法的学科，其研究对象通常是可量化的，其数量是变化的。以经济学为例，其研究对象如供给、需求、价值、价格、利润、利息、工资等等，都是可量化的。所以，把数理方法引进经济学，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当然思想产品也可量化，如每年发表的论著数，便是一个量化概念，可以建立这个数量对时间的函数。从总体上看，每年发表的学术论著的数量是时间的单调上升的幂函数。但其中某一学科每年发表的论著数可能是时间的逻辑函数。

对思想产品进行这种量化研究，就是略去思想产品的单件性，把各种具有不同性质的思想产品当作相同的对象来对待。这种做法在说明科学活动的规模变化、说明科学界学术兴趣的转移等问题时有其价值。尤其是把经济学论著的年发表数量与

其他学科的论著的年发表数量进行逐年比较时，就可看出学术界对经济学兴趣的变化。但这种做法无助于说明某一学科（例如经济学）本身的演化，无助于说明经济学何以从重商主义发展为古典主义，又发展为新古典主义。而为了分析这种变化，就必须承认思想产品的单件性，把不同的思想产品作为不同的对象来看待。这样，有意义的量化概念便不是思想产品的多与少，而是某种思想产品的有与无。

在数学中，研究演化问题的方法主要是以微分方程组形式出现的动力学模型。其基本要求是研究对象在数量上会发生连续变化。因此，它似乎难以用来研究像思想产品这种具有单件性质的对象的演化问题。事实上，以有与无为变化的主要特征的事物远远不仅是思想产品，它是人工界（与自然界相对应）相当大的一批事物的变化特征，为这样一批事物建立普遍适用的数学模型，是一项必要而又艰巨的工作。

思想产品的模糊性即其意义的不确定性。人们往往很难对一件思想产品的基本观点做出明确而又统一的解说。模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同一个时代和社会中，人们往往对同一件思想产品作出不同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解释；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或社会的更替，对同一件思想产品的解释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导致经济学思想产品的模糊性的第一个原因，在于历史上及至今天的大多数经济学论著，在表述方式上远远没有达到完全形式化、公理化的程度。这些思想产品大多通过自然语言来表达，其概念往往缺乏严格统一的定义，其逻辑结构也往往不太严密。自然语言中的概念往往是有歧义的，只有把它们放置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和语言结构中，才具有确定的含义。因此，以自然语言来表述，就造成了经济学中许多思想产品的模糊性，

即其意义的不确定性。

导致经济学思想产品的模糊性的第二个原因，在于经济学说在跨国界尤其是跨语种的传播中，因翻译过程所导致的概念和命题的变异。不同语言中的概念不存在着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因此翻译过程便是用本国语言中定义相近似的概念去替代外文原著中的相应概念。这就往往造成不同语言的人对同一件思想产品的不同理解和解释。思想产品的非形式化程度越高，自然语言越多，则不同语言的人对它的理解和解释往往分歧也越大。

导致经济学思想产品的模糊性的第三个原因，在于人们习惯于把某一个人的经济思想（往往以一本或几本主要论著作为代表，同时兼顾他的其他论著），甚至某一个流派（往往包括两个乃至更多的经济学家）的经济思想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而一个人及一个流派的经济思想实际上是思想产品的复合体。这个复合体中包括不同的论著。它们可能包含不同的分析重点，不同的分析角度，不同甚至也许是对立的命题。这就造成了这个人或这个流派的思想产品复合体的模糊性。一般说来，思想产品复合体中所包含的思想产品越多，时间跨度越大，则该复合体的模糊性便越强。把一个人或一个流派的若干思想产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有助于把握这个人或这个流派的主要思想脉络。但其代价是增加了研究对象的模糊性。

思想产品及其复合体的模糊性，使得经济学家们往往对它们作出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他们常常争论这类问题：某一命题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某一论著的中心论点是什么？某位经济学家的基本观点是什么？某一学派的主要思想、主要特征是什么？等等。例如，对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马尔萨斯、萨伊、西斯蒙第人就各自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第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围绕凯恩斯革命的真谛，西方经济学家展开了持续多年的争论，分成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以及60年代末出现的以莱荣霍夫德为代表的第三种解释。至于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不同解释之间的争论，可以说是时间持续最久、观点分歧最大的了。

这种由于对思想产品及其复合体的不同理解和解释而展开的争论，在近代自然科学尤其是像物理、化学等学科中是不存在的。物理学家们极少因为对牛顿力学的不同解释而争论，极少因为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不同解释而争论。他们之间的争论通常集中在如何解释自然现象上，而不是集中在如何理解和解释对自然现象的某种解释（思想产品）上。而经济科学乃至其他社会科学中间的争论除了涉及该如何解释社会现象之外，还涉及该如何理解和解释对社会现象的某种解释（思想产品）上。结果社会科学家便比自然科学家有更多的理由争论不休。

思想产品的模糊性，使得它的效用带上了不确定性。具有模糊性的经济理论，其政策蕴涵往往是不确定的。例如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凯恩斯主义解释成不重视货币政策而只注重财政政策的理论，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强调凯恩斯主义并不轻视货币政策。斯大林的集权型社会主义可以从马克思列宁那里找到理论依据，前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同样可以。

思想产品的模糊性也未尝没有一点积极意义。有趣的是，模糊性越强的思想产品，其生命力倒往往越是久长。这大概是因为它可以经受不断更新的解释，可以通过重新解释注入新的内容以适应新的境况。那种缺乏模糊性的思想产品，难以通过重新解释而注入新的内容，所以一旦时过境迁，便成昨日黄花了。

思想产品效用的不确定性，不仅存在于具有模糊性的思想